

编者按:

2022 年 4 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,明确提出“进一步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”。在现有学科专业目录中,与“古籍相关学科”契合度最高的莫过于“文献学”。

作为“文献学”专业期刊的《文献》杂志,创刊于 1979 年,本期为第 200 期。回顾文献学科与刊物共同走过的历程,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,正是专业期刊在此历史机遇下和时间节点上之所当为。故编辑部于 9 月 22 日召开“文献学的未来”专题研讨会暨顾问编委会,与会专家学者们就相关论题积极建言献策或撰写论文。会议发言的要点,日前已由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”微信公众号安排陆续推送;诸位提交的笔谈或论文则汇入本期,正式出版。

提升文献学的学科地位, 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落到实处

张涌泉(浙江大学)

2022 年 4 月,中办国办印发了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,指出要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,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。今年 6 月 2 日,习近平总书记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,对“两个结合”作了更深刻的阐述,指出要“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,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”,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这里我想结合对《意见》和《讲话》的学习,谈一下文献学的学科建设问题。

(一)文献学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学

中华文明,源远流长;文献典籍,浩如烟海。自先秦至民国,历代先贤撰写了浩繁的图书典籍,蕴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。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,值得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。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,收书 3462 种,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。本世纪初,国家组织编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收书 5213 种,规模达《四库全书》的 1.5 倍。但即便如此,被

这两种大型总集所收录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二十分之一(前几年编纂的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古籍书目约20万种)。面对如此巨量的传世文献,普通读者如何找书、读书?如何去其糟粕、取其精华?如何传承弘扬、推陈出新?推动和促进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,需要一个重要的抓手。加强文献学的学科建设,厚植国人古文献方面的学养,培养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,则是一条必由之路。

由于种种原因,以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传世典籍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认识,甚至一度视为封建糟粕,拉杂摧烧之。就我自己而言,整个小学、中学阶段都处在这样的时期,所以国学的基础知识薄弱。后来恢复了高考,上了大学,才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古代的典籍和文化。特别值得庆幸的是,我在研究生期间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系统学习,补上了文献学这一课。1984年,大学毕业在义乌图书馆做了两年半古籍图书编目工作之后,我考入杭州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学专业读研究生,所长姜亮夫先生亲自制订了培养方案,规定每个研究生都要读12种中国传统经典,并且在全国延揽名师给研究生授课,除了本校的蒋礼鸿、陈桥驿、郭在贻、沈康身、龚延明、张金泉、倪士毅等名师外,还包括上海文史馆研究制度史的钱剑夫先生、北京文物局研究版本学的魏隐儒先生、中国美院研究艺术史和《周易》的王伯敏、章祖安先生,等等,从而得以系统学习了目录学、版本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等课程,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学基础,也为我后来从事敦煌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创造了条件。积四十年古籍整理研究之经验,我深深感到,文献学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学,甚至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。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文献学基础的人能正确阅读古代文献典籍,能够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,更遑论传承弘扬、发展转化了。

(二)文献学目前的学科地位

按高校现行的学科体系,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下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,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主要依托学科。但国家的学科目录中却把文献学依附于图书情报学之后,后者由图书情报学为主导,涵盖图书馆学、情报学、档案学、博物馆学等,跟古籍整理工作性质不同,研究内容差别很大。另外,中国史一级学科下有历史文献学,与古典文献学的关系不明不白,互相纠缠不清。也就是说,文献学现在分隶于中国语言文学、图书情报、中国史三个一级学科,各吹各的号,各唱各的调,三者之间类属不明,边界不清,让人无所适从。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、评奖也都没有专门的文献学门类,申报或评审时只能附属于图书情报学或历史、文学或语言专业,似乎有一种到处不着边的感觉,严重挫伤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,也不利于古籍人才培养。

(三) 建议设立文献学一级学科

《意见》提出要“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”,极其重要,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加快古籍整理相关学科的调整和建设。本人曾在《传承与弘扬:推进新时代的古籍整事业》一文(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22年7月8日)中建议把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、历史文献学从中国史分别独立出来,在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下,设置文学、语言学、文献学三个平行的一级学科,文献学一级学科下设经学、语言文献学(含古文字学)、文学文献学、历史文献学(含敦煌学、写本学)、哲学文献学、艺术文献学等二级学科,庶几纲目清晰,界限分明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文哲学部副主任、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跃进多年前著有《中古文学文献学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),就是文学文献学领域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。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近年来一直倡导“文献语言学”(主编有《文献语言学》学术集刊),在“文献语言学”的微信群里聚集了四百多位学者,阵容壮观。同样,文献学门类下也可以有“语言文献学”。这样调整后的学科分类,对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。

最近,读到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刘宁《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,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》一文(《人民政协报》2023年8月8日第7版),建议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基础,整合历史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下的相关学科,在交叉学科门类中设立“古典文献学”一级学科,将古籍整理研究、古籍保护修复、古籍编辑出版、古籍数字化、古籍普及传播等各环节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统合起来,进行古籍人才的全过程综合培养,建立并完善涵盖古籍普查、登记、保管、修复、整理、出版、研究、阐释、宣传、推广、普及、传播、数字化、智能化等领域专业学科体系。看来,提升文献学的学科地位确实是大势所趋,已然成为学术界共同的呼声。至于如何调整,其下的二级学科如何分设,则可征求各方意见,进一步凝聚共识。期待有关部门集思广益,积极作为,把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落到实处,建立更加科学完备的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体系,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,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贡献。